在滨州 知滨州 爱滨州 建滨州·百名历史人物

建筑设计大师张镈

侯玉杰

张镈(1911—1999)，无棣县车王镇段家村人，1911年4月出生于广州，其父张鸣岐时任清政府的两广总督。

张镈自幼聪明好学，先后受业于南开、汇文、复旦诸校。1930年考取张学良担任校长，由梁思成教授任教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美术教师则是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镈转入清华大学，再到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建筑系继续学习。1934年大学毕业后，经考试进入全国最知名且最大的建筑设计单位基泰公司，主要工作地点在天津事务所。在基泰公司，他得到著名建筑师杨廷宝的悉心指教，一直工作到1951年。其间，1937年升任主任建筑师。1941年1月至1948年12月，全权主持基泰公司华北方面的业务。他还曾担任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教授六年，承担三门主课。在这里，他最大的贡献是承接了北京故宫中轴线及其外围的文物实测、详录事宜。

日军占领北京后，建立了伪政权。梁思成、朱启钤等爱国的建筑专家都担心北京故宫遭受战火的破坏，他们希望把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有着极高文物价值的故宫进行实测绘图。在文物专家们的周旋下，伪政府同意拨款，这项任务最终落到张镈头上。从1941年开始，他带领部分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和土木系当年的毕业生开始了故宫中轴线及其外围的文物实测工作。全部工作到1944年结束，绘成大张图纸360余幅。这些图纸绘制精准，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故宫维修时都以它做蓝本，成了国家重要的文物。

1949年，张镈升任香港基泰公司主任建筑师，到香港定居。他的生活待遇优厚，月薪十余两黄金，住着豪华的寓所，业务也很繁忙。1951年3月，他毅然抛弃香港的优厚待遇回到北京，受到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的接见，任永茂建筑公司(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在不长的时间内，张镈就完成了天桥剧场、自然博物馆、友谊宾馆、民族文化宫等众多建筑的设计任务。友谊宾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那富有民族风格的设计，不仅是他自己的钟爱，也被建筑界引为典范。他的恩师、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此十分赞赏。民族文化宫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被称赞为：“建筑民族化风格设计的典范”。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以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其中的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三项由张镈负责，而万众瞩目的则是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要求最高的人民大会堂。此时，离1959年的国庆节不到400天。人民大会堂的初始方案选定了北京规划院赵冬日的，在所有7轮的评比论证中，张镈全部参与，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北京市政府把整个方案的具体设计工作交给了张镈和朱兆雪，并由张镈主持，他成了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设计师。由于时间紧迫，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张镈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立即被付诸实施，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张镈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一连几天不回家。人民大会堂的重点是万人大礼堂。如何处理好这偌大的空间？如何体现艺术风格？在周总理的启发下，他将大礼堂设计成圆弧形。为了打破穹窿顶的单调，张镈做了三圈水波纹暗槽灯、中心镶嵌直径五米的五角星灯，围以一圈镏金葵花瓣花饰。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葵花瓣象征心向共产党的各族人民，三圈水波纹象征在党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1959年9月2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主持了庆功宴会。张镈代表设计集体出席，并有幸被安排在周总理就座的主宾席上。席间，总理举杯来到张镈身边，一边给他敬酒，一边夸奖说：“我很满意，给你们打个五分！”

“文化大革命”中，张镈受到冲击，惨遭迫害，妻子为此精神失常。1972年底，在周总理等人的亲自过问和关照下，张镈再度受到重用，担任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总设计师。1976年，他参加北京新图书馆的设计工作。1978年起，他参与策划和设计人民大会堂大修、改造、扩建工程，民族文化宫扩建工程、钓鱼台国宾馆、国际大厦以及北京旧城区62平方公里的科研与规划等国家重点工程。作为知名的建筑师，张镈一生主持、指导了百余项重大工程，数量之多，造诣之深，世界少有。其中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友谊宾馆等建筑成为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

张镈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八、九届人大常委，曾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班导师。1978年，国家建设部为其颁发了建筑设计终身大师铜牌。是1989年国家命名的十位“建筑设计大师”并名列首位。1999年7月1日，张镈在北京病逝，安葬于故乡无棣县段家村张氏族坟的母亲墓旁边。

张镈回忆自己的建筑生涯时说：“就建筑艺术而言，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梁思成，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修养方面；另一个是杨廷宝，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设计实践方面，正与梁师相辅相成。”张镈经常撰写文章，晚年仍然笔耕不辍，1993年出版了《我的建筑创作道路》，这是当代中国建筑师完成的第一本自传。该书用纪实的手法，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为主，将60年的建筑创作历程、经验，浓缩在24万字的书中，将一代建筑师的成长道路展现在世人面前。

张镈热爱家乡，情系桑梓。1990年，他不顾80岁高龄，亲自到无棣实地考察，不计报酬，设计了海丰塔图纸。该塔高42米，共13级，为八角楼阁式密檐砖石结构，外面一色的青砖砌就，飞檐挑角，角系铜铃。既古朴典雅又坚固耐久，既保持了唐塔的风貌，又在建筑结构上有所创新。海丰塔成为无棣的特色建筑之一，与重新修复的大觉寺一起，成为无棣县的旅游胜地。他还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手稿、图纸、信函、照片等宝贵资料捐献给了无棣县档案馆。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略有修改。

穿越千年看黄河下游堤防演变(中)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卢艳

民国时期堤防的加修与损坏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四分五裂，黄河河务荒废。因河务经费积欠，河工多年失修，风雨剥蚀，再加战争毁坏，堤防、埽坝残破不堪。

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成立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规划，增培堤防，改砌石坝规定，凡低于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洪水位者一律加高2尺，并对险工坝基和坝垛做了相应的整理和加修。现属滨州河务段堤防，当时只将惠民崔常、滨县张肖堂险工秸埽改为石坝；滨县赵家坝(兰家前身)修建坝基四道。道旭、王旺庄等险工均用石料整修。

民国廿四年(公元1935年)培修了赵家坝至张肖堂大堤长六公里(《山东河务特刊》)。

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对下游堤防进行一次较全面的培修，加至堤顶宽7米，普遍加高不到1米。但施工时，坯土厚约四~五分米，用灯台硬片碱夯打，遍数不一，密实度不能御水；由于堤防险工失修而不管理，更惨遭战争破坏，失去抗洪作用，据山东河务局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调查报告述：“南岸自长清北店子至蒲台郑觉寺(今麻湾附近)约长一百九十余里，均经去年驻军挑挖战壕，……顺堤交通沟、单人战体、大小盖沟触目皆是。所有石坝亦多被挖空改为碉堡，水势稍涨，危险立至。”“……五甲杨险工溜势上提，距堤仅五、六十米；赵家坝工情亦甚吃紧；蝎子湾大溜下移到刘春家；张肖堂去年抢险所修石坝多未完整；北岸唐家东、王枣家、南岸禹王口、冯家、王旺庄各险工或堤身单薄或坝身冲断或埽坝残缺或根石不固。”

尔后，黄河改道，山东河竭，堤防无人管理，日本军侵占时期，以堤防为作战工事，破坏惨重。沿堤村民为避水患兵荒，亦在堤上挖洞、建房，鳞次栉比。獾狐、地猴等聚结成群，营巢造穴，大量繁衍，更使大堤隐患丛生。据1946年6月18日《渤海日报》记载：“我解放区坚决执行南京洽黄协议，动员十五万人投入修河工程，并于上月底先后开工，在粮食、器材、运输、技术等严重困难下，通过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修补河堤残缺，填塞壕沟兽穴初步工程大体完工……”

时至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黄河归故道，国民党政府企图破坏解放区治黄，派军队于8月占领道旭渡口，挖军沟、修筑碉堡，整个道旭险工破烂不堪。由道旭至麻家仅半里，即有深没人顶大沟五道(《渤海日报》9月30日)。据不完全统计，惠民地区黄河大堤有大小军沟187条，碉堡指挥所57处，獾狐洞穴无法统计。

解放初期埽坝。